

非认知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阮郭沁

武汉文理学院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实证非认知能力(大五人格五维)对工资的影响,维度包括尽责、外向、亲和、开放、情绪稳定。研究发现:在传统人力资本(教育、经验)之外,非认知能力作为“软技能”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非认知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 工资收入; CFPS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8020

0 引言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89%,农民工总量比2020年增加约1555万人,超过3亿。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再当“过客”,他们要落户、要社保。工资怎么定?传统研究总盯着学历和智力,可现实中,责任心、合群、情绪稳定这些“软技能”,会不会也影响他们的收入?尤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就业帮扶怎么搞、收入差距怎么缩,最终也绕不开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

1 文献综述

1.1 非认知能力的定义及测度

人力资本是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关键预测指标。传统模型遵循单一价格定律,认为同等生产力者同酬,收入差异仅源于技能差异。但近年学者指出,“能力”不应限于认知,还需纳入非认知能力。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日益倾向于将大五人格特质作为评估非认知能力的主要框架,这一方法已渐成学界共识。

1.2 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个人及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了解哪些能力或技能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成功(Lindqvist和Vestman, 2009)。学界普遍认定,包括毅力、动机、情绪稳定性和社交技巧在内的非认知特质,对劳动力市场表现起着核心关键作用。早期研究已充分表明,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1.3 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Hilger et al., 2018)。直接机制体现为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即非认知能力可视为个体禀赋的一部分,直接与劳动生产率相关(Almlund et al., 2011; Hilger et al., 2018)。间接机制则在于非

认知能力能通过影响教育水平、职业选择、求职方式、职位晋升、就业渠道等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非认知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直接效应层面,尽责性、外倾性、亲和性、开放性与情绪稳定性五项特质,分别从降低监督成本、改善人际协作、减少团队摩擦、提升学习适应力及保障压力下稳定产出等维度共同提升个体生产效率,进而反映为薪酬水平的上升。间接效应则更为迂回——经由提升教育回报率以积累人力资本,再借助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影响工作配给与职业类型,两条通道层层传导,最终亦落脚于工资决定。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CFPS,该调查覆盖25省、约1.6万户,已发布七期数据,具全国代表性。其中CFPS2018首次增设非认知模块,采用15条目的BFI-S量表,在国内大样本中系统收集了大五人格信息,但后续无续测。本文选取CFPS2018,将样本限定为1980年后出生的农业户籍者,剔除缺失与异常值后,最终有效样本为2561个。

3.2 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 对数工作总收入。本文选取CFPS2018的工资总收入为代理变量,为缓解偏态分布,按通行做法对其取对数。

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文献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维,每维度设3个Likert5级题项,经逆向调整后标准化(均值为0,标准差为1)消除量纲,用均值法合成各维度得分,再加权求和得总分,总分越高能力越强;为使可比,进一

步将总分标准化为均值 0、标准差 1 的 Noncog_i 值，用以衡量受访者非认知能力水平。

$$\text{Noncog}_i = \frac{\text{score}_i - \overline{\text{score}_i}}{\sigma_i} \quad (1)$$

score_i 代表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初始得分； $\overline{\text{score}_i}$ 为所有个体非认知能力初始得分的平均值； σ_i 则为所有个体非认知能力初始得分的标准差。

控制变量：根据劳动经济理论，文章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变量，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水平。

3.3 模型构建

本研究在明瑟方程的基础上加入非认知能力维度，运用半对数 OLS 回归考察各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作用。计量模型如下：

$$\ln \text{Wage}_i = \beta_0 + \beta_1 \text{Noncog}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Wage_i 为个体 i 的工作总收入加 10，单位为元 / 年； β_0 为截距；Noncog_i 为核心解释变量——非认知能力， β_1 为其工资回报率；为控制混杂

因素，模型中纳入了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及年龄平方、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统一以向量 X_i 表示，相应系数向量为 β_2 ；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以 OLS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对其工作总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型（1）到模型（4），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值稳定在 0.555 至 0.709 之间。具体而言，在模型（1）中控制了全部变量后，非认知能力的系数为 0.55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非认知能力每提高 1 个标准差，新生代农民工的年工作总收入平均增加约 55.5%。

表1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wage	工作总收入（元 / 年）	34360.86	44861.37	1	500010
Noncogi	非认知能力	2.28e-08	0.60	-3.80	1.59
married	婚姻状况	0.60	0.49	0	1
sex	性别	0.49	0.50	0	1
age	年龄（岁）	28.67	6.11	16	38
age_sq	年龄的平方（岁 ^2）	859.50	337.61	256	1444
edu_year	受教育年限（年）	4.66	1.23	1	8

表2 农民工非认知能力与工作总收入

	(1)	(2)	(3)	(4)
非认知能力	0.555*** (0.152)	0.709*** (0.149)	0.681*** (0.149)	0.676*** (0.149)
婚姻状况	-0.438** (0.223)			-0.773*** (0.231)
性别	0.830*** (0.155)		0.852*** (0.160)	0.778*** (0.160)
年龄（岁）	1.560*** (0.113)	2.112*** (0.101)	2.125*** (0.101)	2.234*** (0.102)
年龄的平方（岁 ^2）	-0.023*** (0.002)	-0.033*** (0.002)	-0.033*** (0.002)	-0.034*** (0.002)
受教育年限（年）	0.982*** (0.072)			
常数项	-22.326*** (1.327)	-25.099*** (1.259)	-25.656*** (1.258)	-27.227*** (1.284)
样本量	2561	2561	2561	2561
R ²	0.3044	0.2358	0.2442	0.2477

注：表中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稳健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将非认知能力的五个维度合成为综合指标。KMO 值为 0.704，Bartlett 检验 p<0.001，适合分析。以特征值大于 1 提取第一主成分（特征值 2.611，方差贡献率 52.22%），作为综合指标，

计算因子得分,得分越高表示非认知能力越强。

稳健性检验中改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主成分作为综合指标(见表3)。两种测度方式下,非认知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准回归系数为0.555, $p<0.01$;主成分分析检验系数为0.371, $p<0.01$),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不依赖于非认知能力的特定测度方式,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非认知能力	0.555*** (0.152)	0.371*** (0.089)
婚姻状况	-0.438** (0.223)	-0.466** (0.224)
性别	0.830*** (0.155)	0.841*** (0.154)
年龄(岁)	1.560*** (0.113)	1.527*** (0.114)
年龄的平方(岁 ²)	-0.023** (0.002)	-0.023*** (0.002)
受教育年限(年)	0.982*** (0.072)	0.992*** (0.071)
常数项	-22.326*** (1.327)	-21.782*** (1.338)
样本量	2561	2561
R ²	0.3044	0.3054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CFPS2018数据,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年均收入约增加55.5%,且在控制了传统人力资本变量后该效应依然显著,表明软技能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独立且不可忽视的经济回报。年龄与工资呈倒U型关系,峰值出现在34岁附近;男性工资显著高于女性,教育年限回报率约为98.2%;婚姻状况系数为负,其内在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

从政策层面看,可着重在三方面发力:将非认知能力培育纳入现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强化沟通、协作与情绪管理等社会情感技能;持续关注并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保障女性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与薪酬对待;进一步扩大农民工受教育渠道并提升职业培训质量,夯实人力资本积累。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局限。受截面数据可得性约束,当前结论主要反映相关关系,尚不宜做因果推断;非认知能力的测量依托自我报告,可能受社会期许偏误影响。未来可利用追踪数据或引入实验设计,辅以更为客观的测量工具,以深化对作用机制的理论识别。

参考文献:

[1]Almlund M , Duckworth A L , Heckman J J ,et al.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1, 4(3):1 - 181.

[2]Hilger A, Nordman C J, Sarr L.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hiring channels, and wages in Bangladesh[R].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18,1578.

[3]Lindqvist E, Vestman R .The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Enlistment[J].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 3(1):101-128.

作者简介: 阮郭沁(2000—),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